

河南省“九五”哲学
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东方文明的中国宋代文化之魂 ——中国宋学与东方文明研究

杨翰卿 丁 素 著
赵冰波 徐初霞

一九九八年九月

河南省“九五”哲学
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东方文明的中国宋代文化之魂
——中国宋学与东方文明研究

杨翰卿 丁 素
赵冰波 徐初霞 著

一九九八年九月

目 录

绪 言	(1)
一、宋学和宋代文化	(1)
二、宋代文化对于东方文明的意义	(4)
三、宋代文化与东方新兴现代化模式	(8)
第一章 宋之时代精神的精华—哲学(一)	(1)
一、张载的哲学思想	(13)
二、王安石的哲学思想	(20)
三、周敦颐的哲学思想	(26)
四、邵雍的哲学思想	(32)
五、二程的哲学思想	(36)
第二章 宋之时代精神的精华—哲学(二)	(49)
六、朱熹的哲学思想	(49)
七、陆九渊的哲学思想	(60)
八、陈亮的哲学思想	(68)
九、叶适的哲学思想	(72)
第三章 宋代的伦理精神	(77)
一、理学兴盛与伦理特征	(78)
二、功利主义思潮与伦理道德观念	(85)
三、理学中的道德修养术	(104)
四、道德规范的新变化	(114)
第四章 宋代的教育思想及其实践	(123)
一、门类齐全的官学教育	(123)
二、繁荣兴盛的书院教育	(133)

三、科举制度的新发展	(141)
四、独具特色的教育思想	(154)
第五章 宋代的文化纷争与融汇	(169)
一、义利之争	(169)
二、华夷之辨	(178)
三、朋党斗争中的文化异同	(186)
四、儒佛融汇	(193)
第六章 宋代文化精神与我国北方少数	
民族文化	(207)
一、辽宋之间的文化交往	(207)
二、汉文化与党项族	(217)
三、汉文化与女真族的封建化	(220)
第七章 宋代文化的核心精神对我国近	
现代思想文化的影响	(229)
一、宋代儒学文化在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中	
的地位和作用	(229)
二、宋代儒学文化在中国近现代的主要表现	
及其演变	(241)
三、宋代儒学文化在中国近现代的历史命运 ..	(251)
第八章 宋代文化精神在亚洲的传扬	(260)
一、宋代文化对朝鲜的深远影响	(260)
二、宋代文化在日本的引入和发展	(269)
三、宋代文化在越南的传播	(278)
四、宋代文化在东南亚其他诸国的传播	(286)
五、宋代文化与水上“丝绸之路”	(292)

第九章 宋代文化精神与现代东亚文明	(303)
一、宋代文化的核心精神及其特质	(303)
二、宋代文化精神在现代东亚文明中的 地位和作用	(310)
三、儒家文化的当代转换问题	(322)
后 记	(333)

绪 言

本世纪后几十年以来,随着“东亚奇迹”又有“东亚危机”现象的产生,在思想观念和学术文化领域,便有“亚洲价值”、“儒学资本主义”以及“东方神话破灭”之说。这是个非常现实而又紧迫的重大研究课题。我们中原宋学研究会的学者于1996年撰写出版了《中国宋学与东方文明》一书,试图从宋学与东方文明的联系上介入这一重大课题的研究,具有很多创获,取得了一些重要结论。然而近年来亚洲社会变化之快之大,令人所始料难及,不断地或者说较多较快地产生着新问题、新情况、新特点、新局势,要求人们去作新的深入研究和探讨,从而取得更多的创获,得出更为科学的实事求是的论断。正是基于此,我们在完成《中国宋学与东方文明》一书后,接着结合新的形势和变化,作进一步地思考和研究。《东方文明的中国宋代文化之魂—中国宋学与东方文明研究》,就是这一思考和研究成果。

一、宋学和宋代文化

在《中国宋学与东方文明》一著中,石训先生撰述的绪论对宋学的内涵及其研究对象作了界定。认为,从历代学者对宋学的不同看法来说,大体有广狭两种见解。广义宋学指中国宋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称,囊括宋代整个社会的文明成果。狭义宋学

是中国宋代以哲学理论为核心的文化理论体系,或曰宋代学术思想。并且确定,该著取宋学狭义加以研究和论述。基本点有三。其一认为,宋学有别于宋代哲学。因为宋代哲学是宋学的核心部分而不是宋学的全部,除了核心还有丰富的外围部分。也就是说,宋代哲学是宋学的升华、凝结和抽象,宋学是宋代哲学丰厚的文化基础或基础理论;其二认为,宋学也不同于宋代学术。宋代学术是个庞大的、具体的、多样的学术体系,宋学不研究整个体系的学术表现和它所包含的具体形态,而是研究整个体系和具体形态的学术思想产生、发展及其规律性和它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其三认为,宋学也不同于宋代儒学。宋代儒学是先秦儒学重整旗鼓,并取得新的辉煌的儒学。宋学不是单单的儒学,它要研究儒、道、法、佛和伊斯兰等诸家学说在宋代的学术形态,研究它们的发展过程和它们在宋代达到的水平,特别是要揭示出儒、佛、道相融合以后的名义上儒学所包容的佛、道内容,从中发现思想发展规律,实事求是地阐明其社会地位和作用。简言之,宋学是中国宋代以哲学理论为核心的文化理论体系,即宋代学术思想。它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从纵的方面说是中国学术思想发展到宋代的形态和水平;从横的方面说是宋代社会的各种学术思想。^① 这是中国宋学。

关于宋代文化,历来撰述尤多,或繁或简,或褒扬或贬黜,论说各异。这里以河南大学姚瀛艇先生主编并于1992年出版的《宋代文化史》为例,略述一二。姚瀛艇先生在该著绪论中指出,从“狭义文化史的范围,探讨两宋时期文化的特色和发展大势,考察这几百

^① 见李保林、杨翰卿、孙玉杰主编《中国宋学与东方文明》,河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4月版,第1-2页。

年间中华民族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主观世界发生着怎样的变迁。”也就是说,宋代文化是指宋代的“社会意识形态(如思想、道德、风尚、宗教、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等等)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即宋代的“精神文化以及精神文化的物化现象”。^①在狭义文化的理论基础上,该著认为,宋代文化无论在人生理想、精神境界、道德情操、审美意识、价值观念或社会心态、礼俗风尚乃至生活情趣等等方面,自与前代有所不同。这些不同则构成了宋代文化的如下特点:即宋代社会文化素质,较前代为高;知识受到尊重;先秦儒学的积极淑世精神得到发扬;学风丕变、儒学复兴与新儒学即理学产生;商品经济空前发展,在文化领域产生了重大影响。对此,该著从宋代的右文政策,馆阁制度与图书编纂,繁荣的刻书业,学校书院与科举,学术思想(包括佛道及儒道佛的融合、经学、新儒学、教育思想、伦理思想、史学等),方志与金石,诗词话本,绘画音乐舞蹈,风俗习惯,等等方面,进行了阐述。^②表现了宋代文化的绚丽多姿和丰硕成就。这是宋代文化。

上述可见,宋代文化和宋学是一种蕴含交错的关系。宋代文化包含宋学并且以宋学为主要内容,但较宋学更加宽泛涵盖更广,宋学无疑属于宋代文化的范畴,但仅限于宋代学术思想。

基于这样的理解,我们在本书的内容安排上取舍于宋代文化和宋学之间,且从宋代文化的角度进行阐述和研究,取名为《东方文明的中国宋代文化之魂》。这里“魂”的意义有三。一是表明宋代文化的精华、精髓或灵魂。因为考虑到本书篇幅的限制,或宋学或宋代文化,文中一般择其要而述。二是表示宋代文化在东方文

① 姚瀛艇主编《宋代文化史》,河南大学出版社 1992 年出版,第 1 页

② 见姚瀛艇主编《宋代文化史》。

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影响,时至当世,仍遍及东亚国家和地区。三是表明这种影响的双重性质,即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的负面作用。故此。本书内容结构大体为:全书除绪言外,共九章。前两章述论宋代哲学,以张载、王安石、周敦颐、邵雍、二程、朱熹、陆九渊、陈亮、叶适等人的哲学思想为重点。宋代哲学是宋代文化或宋学的核心,是宋之时代精神的精华,故将其置于全书之首;第三、四、五章述论宋代的伦理精神、宋代的教育和文化纷争。这部分内容也是宋代文化或宋学的重要部分和非常突出的文化现象,其与宋代哲学共同构成了宋代文化或宋学的主要内容。至此即该书的前半部分,专述宋代文化或宋学的内容。第六至第九章,以宋代文化与东方文明的关系为线索,包括宋代文化与中国北方少数民族文化的关系,对我国近现代思想文化的影响,在亚洲的传播和光扬,以及宋代文化精神与现代东亚文明的关系。这一部分是全书的又一重心,也是落脚之点,体现了学术研究为现实服务的精神。因为,我们进行该课题研究的目的和指导思想,就是要在东方文明中给宋代文化或宋学一个合理的地位,特别是试图揭示以儒学为核心和精髓的宋代文化在现代东亚文明中的合理地位,从而从这个角度和侧面,表明我们对所谓“亚洲价值”,“儒学资本主义”、“东亚新兴现代化模式”,以及新近出现的所谓“东方神话的破灭”等问题的看法。

二、宋代文化对于东方文明的意义

如果遍览中国、朝鲜、日本、越南等东亚国家学术文化乃至社会文明发展的历史,便可强烈地感到宋代文化的重大影响。当然,宋代文化传至东方各国,均和各国的学术思想和民族文化相结合,

存在着被接受、改造和融合的问题,即使在我国,宋代以降也有对宋代文化的服膺、改造和重构。说明宋代文化在东亚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方面,起到了很大作用,对东方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这可以说是东方文明发展中的一大奇观,值得玩味和深入研究。这里以宋代儒学文化为例,略作简要考察。

宋代儒学是融合了佛老之学的新儒学。在与佛老等异质文化的关系上,宋代儒学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即一方面崇儒排佛老,另一方面又援佛老入儒。从儒佛关系看,宋明新儒学的这一基本特征的确蕴含着极为深刻的意义。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标帜,传统佛教是印度传统文化的代表。二者分别为中国和印度这两大文明古国矗立世界文化之林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又都广泛地在亚洲地区传播和发扬,汇合而成为东方文明的主要成份。这种奇特的历史文化现象注定了二者互相排斥又互相融合的历史命运。如果只有排斥、对立和水火不容,佛教不可能传入中土或中国主动的遣使天竺,引进浮屠。如果只有融合统一而没有差异对峙,那就无所谓儒佛两种文化,同时也大大影响或削弱东方文明的丰腴斑驳和靓丽。排佛,表明了儒家文化特别是宋代儒学独立、发展、图强的鲜明主体意识。融佛或儒佛互融表明了这两种文化竞相发展争夺文化制高点以及共同具有的开放兼容精神。一定意义上说,正由于儒佛之间的融合,才可能有中国或日本的僧人和儒僧,作为文化使者从事儒佛文化的传播工作。这样看来,宋儒或宋佛之儒佛融汇,为这两种文化在东方文明中莫立重要地位,是发挥了特殊作用的。

宋明新儒学是现代新儒学尊崇服膺的主要文化精神。现代新儒学基本上是我国贯穿于 20 世纪始终的一大文化思潮。从现代新儒学的形成发展中,也可以看出宋明儒学在现代的地位作用和

学术文化的长久生命力。方克立先生为现代新儒家作了这样的界定,即认为:“现代新儒家是产生于本世纪 20 年代、至今仍有一定生命力的,以接续儒家‘道统’,复兴儒学为己任,以服膺宋明理学(特别是儒家心性之学)为主要特征,力图以儒家学说为主体为本位,来吸纳、融合、会通西学,以寻求中国现代化道路的一个学术思想流派,也可以说是一种文化思潮。”“尊崇宋明理学是现代新儒学的共同精神取向。他们所理解的儒学的基本精神,其实就是宋明理学的精神,即以儒家心性之学为中国学术文化之本源大流,强调以‘内圣’驭‘外王’,通过提高道德以的追求‘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① 现代新儒家或推重宋明理学中的陆王心学,或明确表示“接着”程朱理学讲,或主张由儒家心性之学的“内圣”开出科学、民主之新“外王”即“返本开新”,或努力于谋求儒学的第三期发展,等等,都集中地表现出现代新儒家学人的宋明儒学情结,也表明宋明儒学的现代影响。

宋代儒学被引入朝鲜发展成为朝鲜朱子学。费正清、赖肖尔、克格雷在其《东亚文明:传统与变革》一书中指出:“李朝时期,儒学思想在朝鲜达到鼎盛。这首先是因为中国本身重新强调自唐朝末年以来的儒学思想和宋朝朱熹哲学及其他著名思想家对其所作的发展和系统化。”^② 韩国学者黄秉泰先生在其《儒学与现代化——中韩日儒学比较研究》一书中指出:“韩国的儒学家都虔敬地笃信朱熹之理和严格的道德(他们视朱熹为孔子和圣人之道的真正传

^① 方克立:《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7 年 11 月版,第 19、20 页。

^② 费正清、赖肖尔、克格雷:《东亚文明:传统与变革》,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2 年 1 月版,第 303 页。

人),他们倾向于把孔子和朱熹的中国奉为儒家之道的圣地。”^①这样,由于程朱理学在朝鲜的传播和发展,产生了像李退溪(名,字景浩,号退溪)那样被称为东方朱熹和李栗谷(名珥,字叔献,号栗谷)那样的儒学巨擘等代表人物,分别创立了岭南学派和畿湖学派不同的朝鲜朱子学学派。“李退溪和李栗谷被尊为韩国儒学的成双支柱,他们两人对官场和学术界都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由于有这两位儒学大师,韩国的朱熹理学逐渐挺立于坚实的文化基础之上,并影响整个社会。它逐渐脱离社会政治环境之日常需要,成为高居于韩国社会制度之上的完善的文化体系。国家、社会和民族成为受儒学文化体系支配的对象。”^②可以看出,程朱理学在朝鲜传播发展的巨大成就和深刻影响。

宋明儒学在日本发展成为日本朱子学、日本阳明学和日本古学派。日本朱子学以藤原惺窝、林罗山、山崎暗斋、贝原益轩等人为代表。其中藤原惺窝(名肃,字敛夫,号惺窝)为该学派的开创者,惺窝尊崇程朱,阐发理学,但亦不废陆王。林罗山(名信胜,字子信)则专尊朱学,力排佛老,贬抑陆王,并且进一步发展朱子学。山崎暗斋更是视朱子学如宗教,朱学外别无学,有即异端邪说,对朱子学心体力行,理论上采取教条主义,行动上以“敬”为本,采取严肃主义。从藤原惺窝到山崎暗斋,不论是出入于程朱陆王之间,还是专尊朱子,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协调神儒,用儒学理论充实日本神道体系,以至山崎暗斋创出所谓垂加神道,使中国儒学日本化。致于贝原益轩,则表现出继承、修正、创新朱学,综合吸收其他

① 黄秉泰:《儒学与现代——中韩日儒学比较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1月版,第383页。

② 黄秉泰:《儒学与现代——中韩日儒学比较研究》,第405页。

各家学说的特点。日本阳明学以中江藤树、熊泽蕃山、佐藤一斋、佐久间象山等为代表。中江藤树(名原,字惟明)是该学派的创始人,他宣传阳明心法,遵循阳明致良知之说,用阳明心学把《大学》、《中庸》、《论语》三书一以贯之,确立起自己的理论。熊泽蕃山(名伯继,字了介)师事中江藤树,注重事功,勇于创新,主张学问应用于国家社会,理论上具有折中程朱陆王的特点。不唯熊泽蕃山如此,差不多日本阳明学派都有兼采程朱陆王的特点,并且与日本朱子学派一样,主张神儒合一,调和神儒,带有日本特色。日本古学派以山鹿素行、伊藤仁斋、狄生徂徕等为代表,其中山鹿素行(名高佑,字子敬,号素行)是其首倡者。日本古学派在形式上是官学朱子学派的反对派,主张师周公孔子,标举《论》、《孟》,弘扬先秦古典儒学。其实,古学派的代表人物往往大多是初修朱子,后倡古学,表现出由宋学而孔孟的特点。日本德川时代的商人思想家石田梅岩,创立了石门心学,其思想内容虽直取孟子,而大部分也是得之于宋代朱子学。综合上述,可以看出,中国宋明儒学在日本德川时代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其影响所及,不仅哲学,也表现在日本的政治、社会道德、宗教、文学等文化的各个层面。

我们进行这样的考察,无心于为中国宋明儒学溢美,只是陈述事实,说明其对东亚诸国的深刻影响。从历史文化的角度观察剖析现代东亚文明,对于东亚儒学特别是中国宋明儒学,可以褒扬肯认它,也可以贬抑否定它,但却无法也不能越过这一历史文化现象。这就是我们对此问题的基本观点。

三、宋代文化与东方新兴现代化模式

由于历史的原因,包括宋代儒学在内的中国儒学传播到东亚

诸国,形成和发展为朝鲜儒学、日本儒学、越南儒学等东亚儒学,被称为“儒学文化圈”。它与当今的东亚经济圈、东亚社会构成一种交融渗透、密切联系、不可分割的整体,姑且可称为现代东亚文明或东方新兴现代化模式。在现代东亚文明中,儒家传统文化因素究竟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发挥何种作用,本来已在以西方的马克斯·韦伯为代表和东方的“儒家资本主义”观点之间展开否定与肯定的论争。新近随着东亚金融危机的出现和波及,在思想文化的讨论中又掀起新的涟漪,促使人们作新的深入思考。

我们认为,传统儒学文化特别是中国宋明儒学文化,对于东方新兴现代化的诞生和发展,完全否定和完全肯定,都不是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思维方式上都带有片面性和极端化之弊。诚然,儒家思想文化本身不可能转进出现代化的社会生活和文化观念,但是,它在外源刺激和振荡的作用下,却能够以其内在具有的理性精神、开放兼容品格、务实观念等迎接和促进现代化的莅临。特别是它对治于当今西方现代化所暴露出来的各种弊端,更显得有其独特的功能作用。因此,客观冷静地认识传统的儒学文化与东亚新兴现代化模式的关系,仍然是一个迫切而重要的课题。

就中国宋代儒学文化说,它本身具有二重的理论性质。它是在封建制度条件下形成和发展并为巩固封建制度服务的,这是它的政治功能与作用。其理论具有维护纲常名教和等级秩序,压制民主,束缚个性发展,淡薄科学的性质,这是其消极的社会作用。但是,宋代儒学的理性主义精神和经世崇实的价值取向,即又具有超越时代限制的普遍意义。具有这样二重性质的宋代儒学文化,传播和影响至东亚国家,不论是发生了日本化或朝鲜化,随着历史时代的演进,其思想的和实际的作用都肯定是双重的。其一是,宋代儒学是在朝鲜和日本的封建时代被引入和得到发展的,说明中

国的儒学能够适合该国封建体制的需要,维护和巩固其统治,成为该国家占统治地位的官方意识形态。在西学东渐,东亚儒学面临西学的冲击和挑战之际,儒学作为一种本身自足的、完整统一的思想文化体系,对于西学显然抱有不屑一顾而加以抵触的态度,更何况西学在东方传播之初,大多为地理、算学、机械制造、化学等质测之学,即所谓的“声光化电”,这些与儒家的内圣外王之学似乎就不在同一个文化层面上。这是一方面。其二是,中国宋代儒学的理性主义精神和经世崇实的价值取向,又使得它在东亚的传播发展中,随着时代变迁和地域变化,既能兼容佛老,又能与日本的神道、朝鲜的花郎道共处,也能在西学东渐中兼容西学,这是宋代儒学理性主义精神和经世崇实特质中的开放兼容品格决定的。换言之,有着深厚长久宋代儒学精神文化背景的东亚诸国,在跨入近现代社会,容纳西学,并使西学在东方世界驻足发展的,也只有归属于儒学这块文化土壤。由此也就决定了在东亚社会进入近现代化之后,传统的儒学文化既不会完全销声匿迹,彻底退出历史舞台,也不会再像曾经一度的辉煌时期那样,独占鳌头了,而是在外部刺激和挑战的作用下,完成其融摄科学民主精神的历史任务,之后退居历史的次要地位,或者说,与近现代的科学民主精神走共同融合发展的道路。当然彼然间仍然要有冲突甚至对抗。这是一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对立统一关系。

事实也是如此。儒学文化特别是中国宋代儒学文化,在现代东亚社会中被继续进行着新的阐释、改造、转化、弘扬和创造性发展,其在现代东亚社会的实际地位和作用,主要反映在以下几方面:第一,整体上说,儒学文化在现代东亚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社会生活、家庭等方面仍然发挥着重要影响和作用,甚至构成东亚新兴现代化的动力因素之一,促进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精

神文明的建设,但并不是首要的更非唯一的动力因素。构成东亚新兴现代化的动力因素,既有东方以儒家文化为代表所倡导的整体主义和谐的价值观,也有以西方文化为主的所倡导的个人主义价值观,是多元动力因素的综合,并且在东亚社会的不同国家和地区又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同时不同的动力因素在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的作用也是不同的。如果探讨东亚部分国家和地区经济迅速发展原因,主要从思想文化去解释,特别是把它归结为儒家伦理价值观积极作用的结果,认为是儒家“内圣”之学合乎逻辑地开出的“外王”事功,那就既不完全符合客观事实,理论上也失之偏颇,并且随着东亚新问题新情况的产生,也给否定“亚洲价值”的观点以逻辑上的口实,因此是不足取的。

第二,中国宋代儒学文化中的优秀成份和合理精神,在现代东亚社会中的积极影响表现在:理性主义精神和经世崇实价值取向中所包含的开放兼容意识与现代东亚社会的开放吸纳精神相融合,构成新的具有东亚特色的开放意识和实践;宋代儒学文化务实精神强烈,居安思危,改革创业,临危不惧,提出了时代性极强的忧乐观,使儒家传统的忧乐论放出异彩,成为东方文明的奇葩,至今光芒不减,是促进东亚社会改革发展,开拓创进,矢志奋搏的传统精神文化资源;宋代儒家文化中所具有的强化主体意识,重视挖掘人格力量,把传统儒学的“内圣”思想理论化、外在化,在各种社会活动中,倡导积极发挥人的作用,于现代东亚社会仍然是一种无形的精神力量;宋代儒学文化中所倡导的整体主义精神、家族本位思想和家族伦理秩序,以及“信义”、“忠诚”、“中庸”、“和”、“义利并取”等价值观念,在东亚经济现代化过程中转换为推动家族资本主义发展的契机,即仅就经济而言,从日本到东南亚,资本主义发展大都形成中小型家族企业形式,由儒家的“齐家富国”意识转化而

来的“发家富国”意识,也在促进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它较之于西方以个人主义为特征的资本主义具有明显的“人治”色彩、温情主义和劳资关系和谐的优点;宋代儒家文化中重视教育的思想也在转化为东亚社会对人力资源的大力开发,等等。

第三,对于增加社会的物质财富,促进经济的发展来说,包括宋代儒学在内的传统儒学文化,其“重义轻利”的价值取向,偏执“理”“欲”对立的理欲观。又可以说不仅不是动力因素,甚至有某种程度的消极乃至阻滞作用。但是,当社会在某种动力因素的作用下创造了物质财富,发展了经济,如何调节处理对待这些财富,儒家文化似乎却可以派上某种积极的用场,有利于人们较好地把握义利关系。

总之,儒家文化在现代东亚社会即有重要影响,这种影响又具有双重的性质。那么,如何正确衡估和转化利用包括宋代儒学在内的儒家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和积极意义,仍然尚待进一步深入研究。